

成都考古发现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Science Press

成都考古发现 (199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1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第一本年度考古报告集,收录了1999年度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的一批重要考古新资料,其中包括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十街坊、郫县古城、鱼凫村、芒城等遗址,商周时期的成都黄忠村、岷江小区、郫县清江村等遗址,以及一批唐、宋、明时期的墓葬和遗址报告20篇,对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古蜀文化序列和编年意义十分重大。四川唐、宋时期的墓葬极富地方特色,值得探索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唐墓过去发现很少,相信这批材料的发表将有助于许多问题的研究。

本报告集为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从事西南和四川考古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考古发现(199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ISBN 7-03-009165-5

I. 成… II. 成… III. 考古-发掘报告-成都市-1999 IV. K872.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558 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丽源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1年7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1/2 插页:8

印数:1—1500 字数:471 000

定价: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成都考古发现》编委会

主 任 王 毅

副主任 蒋 成 江章华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芳 白玉龙 冯先成 朱章义 刘 骏

刘雨茂 李明斌 肖 璘 张 擎 陈 剑

陈云洪 周志清 荣远大 黄晓枫 谢 涛

雷玉华 颜劲松 魏绍蕃

序 言

人类文化对客观环境有天然存在的适应性，这样，自人类出现后，其文化就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区域性。

但自然环境本身都是会变化的（那怕是很慢的），而人类的活动则又具有不断进步的能力和空间上的流动性，这就既会削弱原有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力度，又将导致人类文化本身面貌及其区域性的不断变化。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同文化区的不可捉摸性。人类的不同文化区，客观上又存在着一定的稳定性，特别是因人类文化的进步速度，愈在早期，愈是缓慢，因而古文化的区域性变化，往往要经历好几百年，好几千年，甚至万年以上才会发生。正因如此，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就有能力把已逝的和现存的人类文化确定为若干区系及其空间的分布位置，并寻找出变化的情况。

我国的古文化，当然也是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考古学家经过近60年的努力，至80年代初已把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铜文化）归纳为6个主要的大区。以后由于一些新发现，现在又可扩大成8个主要的大区。如果今后在松花江流域、新疆、云贵以及西藏等地又有系统的新发现，还可能再增加一些文化区。在已知的8个大区中，长江上游地区是其一。这个区域所以能被确定下来，是因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系列新发现。由此例来思考，将来再增加一些文化区，应当是一定会发生的。

把长江上游确定为8个大文化区之一的主要根据是，成都平原和长江三峡一带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文化的许多新发现。这一区域内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文化，都有相似的、强烈的自身特点，而且这种区域性特点其实还可延续至秦代至汉初，甚至更晚。如果扩大空间范围来观察，这种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当是此时中国西南地区中文化发展程度最高，对其他地区影响最大的一种历史遗存。

在整个中国境内，西南地区的地形最为复杂，崇山峻岭，深谷大川，占有大部分地段，交通不便，因而容易形成不同的族群。直到当今中国，西南地区仍是族群最为众多的区域。由此缘故，这一带也就是古文化的数量最多，相互之间的文化关系最为复杂的。

如从天然形成的地理形势和古文献记载中历史活动情况来观察，成都平原显然是其中心区。这就是说，西南地区的古文化在这里发展的程度最高，并与西南地区的其他古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在相互的交往中，曾给予其他文化以更多的影响。这自然意味着把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探索清楚，对理解西南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来说，当是至关重要的。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云贵和西藏等地的古文化，同相邻的柬埔寨、泰国、缅甸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古文化，亦存在着紧密联系和相互之间的

强烈影响，但当那些相邻之间的文化影响开始衰落之时，从成都平原散播出去的文化因子却更为众多。云贵地区发现的许多汉代的铁器和漆器，就是产自成都平原的；许多汉式墓葬的出现，可能也是源自成都平原一带的汉文化的影响。

在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成都平原的考古发掘开始得比较早，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华西大学就调查和发掘过广汉月亮湾遗址。抗日战争期间，一批居住在大后方的学者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原中央博物馆（今南京博物馆）又发掘了一批彭山的汉代崖墓，有的学者还调查过乐山等地的崖墓。50 年代以后，在成都平原及当时的四川境内（含今重庆市），亦渐渐在较多地点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不过，从总体看，还是一些零碎的、孤立的工作，因而对成都平原及四川全境的考古学文化系列的认识，基本上仍处于茫然状态。

但到了 80 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批年轻学者，终于冲出低谷，异军突起，取得了两大令人瞩目的考古成果。

首先是在 80 年代中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者，几乎同时地找到了早期蜀文化的遗存。一是在广汉三星堆，确定了 1 座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古蜀国的都城遗址，并发掘到两个埋藏坑；二是在成都十二桥发掘了一处时代可晚至西周的古蜀国木构建筑遗迹。这两处发现，确定了商周时期的蜀文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的青铜文化。

第二次大发现是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一批年轻学者在成都市的范围内，找到了大约距今 4 500~3 7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即宝墩文化，并在新津宝墩和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地陆续找到了 7 座属于宝墩文化的古城址，还在郫县古城的中心位置发掘出了长达数十米的大型房基以及在成都十街坊发掘出一批宝墩文化晚期的墓葬。这些古城、大房基、墓葬和大量陶器的特点，已相当充分地勾画出了宝墩文化的面貌，从而为成都平原，乃至更广阔的四川境内的新石器文化的系列或谱系的建立，开始确定了一个基点。由此基点上溯，就比较容易确定什么样的遗存是更早的新石器文化；由此下推，就可以寻找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同三星堆、十二桥的古蜀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即宝墩文化同三星堆文化是直系相承，还是由新来的他地族群综合了几支古文化才形成蜀文化？如果以此为基点再往左右周围寻找，也能较快地确定在四川境内，究竟存在着哪几支新石器文化。

现在，中国境内古文化的谱系，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整个西南地区的情况还是相当模糊，但在不少地点也已有了一点材料。这就可以拿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来和全国其他同时期的文化作比较，并能大体认识到基本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在西南地区中，则是最为发达和水平最高的。如仅就三星堆的蜀文化而言，居于西南地区诸同时期文化中领袖的位置，更是毋庸置疑的。成都平原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地位和文化基础，毋怪乎当战国中期秦国意欲征服东方六国时，要先灭蜀国，以这里的丰厚资源来增强其军事活动的物质后盾。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基础，汉代以后的成都平原就长期被人们认为是“天府之国”。

成都平原既有如此丰厚的物资和文化的资源，并且形成一种传统而绵延了若干代，必定遗留下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从而在成都平原进行考古工作，将是若干代考古学者的责任。显然就是出于这种责任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最近的10多年来，不仅在四川境内首先确定了一支新石器晚期的文化，还在成都市的十二桥、黄忠村墓地发掘了许多西周时期的蜀文化遗存，并且已大致排列出三星堆至黄忠村时期蜀文化主要陶器的序列，推进了蜀文化的研究。此外，还发掘了许多唐宋时期乃至明代的遗址和墓葬。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他们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成都平原的古文化，还把眼光扩大到成都平原以外，最近又同雅安、西昌、茂汶、广元等地区的文物管理部门商量，筹划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同其他考古单位协作，进一步探索那些地区的古文化。只要回顾近10多年来成都平原所取得的考古成果，如果把同样的勇于探索、不畏艰苦，而又平等团结、开放互助的精神发扬光大，四川全境的考古学文化系列，定将大大加快其建设速度。

对于考古工作来说，野外调查和发掘当然是基础，但是否及时把所获资料整理出来并公之于世，又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个道理几乎所有考古工作者都已懂得，但当前由于配合基建而进行的考古工作是如此繁忙，把考古报告的编撰与出版工作长期拖后的现象，真是太多了。据多年的实际经验，解决这个矛盾的工作，当然有许许多多，但最重要的方面，恐怕还是在于许多领导者对发表报告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我今年两次来到成都，先是欣闻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计划每年出版一本考古报告集，最近知道第一本报告集已正式交付出版社。每年出版一本年报，在全球范围内，早已出现，并且数量不少。可惜在我国迄今尚未见到。现在，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终于在我国带头实行这种举动，必将得到大家的赞誉。昔人曾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考古单位编纂年报，就是一种“千里之行”，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已为这种“千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希望能坚持完成这个“千里之行”。我不仅为这个举动感到兴奋和钦佩（因为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为配合基建而进行的野外任务实在是很大、很重的），更希望在出版这个年报的带动下，有许多其他考古单位，也能进行这种“千里之行”。可以设想，如果全国有许多考古单位都发表年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者，将会遇到多么巨大数量的新的考古资源，将能触发出多么丰富的新鲜思考，从而新建立起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丰碑，将会何等深刻地启发着人们的心智，何等强烈地激动着人们的情感！

俞伟超

2000年10月25日，于成都金河宾馆

目 录

序言	俞伟超 (i)
成都市南郊十街坊遗址年度发掘纪要.....	(1)
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 1998~1999 年度发掘收获.....	(29)
温江县鱼凫村遗址 1999 年度发掘.....	(40)
都江堰市芒城遗址 1998 年度发掘工作简报.....	(54)
都江堰市芒城遗址 1999 年度发掘工作简报.....	(99)
成都市西郊化成村遗址 1999 年度发掘报告	(127)
四川省郫县清江村遗址调查发掘收获.....	(146)
成都市黄忠村遗址 1999 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	(164)
岷江小区遗址 1999 年第一期发掘	(182)
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唐宋墓发掘简报.....	(193)
成都市南郊桐梓林村唐代龕公墓发掘.....	(202)
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发掘简报.....	(211)
成都市外环绕城高速路双流白家段发现宋墓.....	(225)
成都市南三环路发现北宋砖室墓.....	(236)
成都市外化成小区南宋墓发掘简报.....	(242)
成都市高新区石墙村宋墓发掘简报.....	(252)
成都市江南馆街唐宋遗址发掘简报.....	(260)
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	(278)
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	(295)
永陵地宫石刻风化原因研究及治理初报.....	(315)
后记.....	(318)

成都市南郊十街坊遗址年度发掘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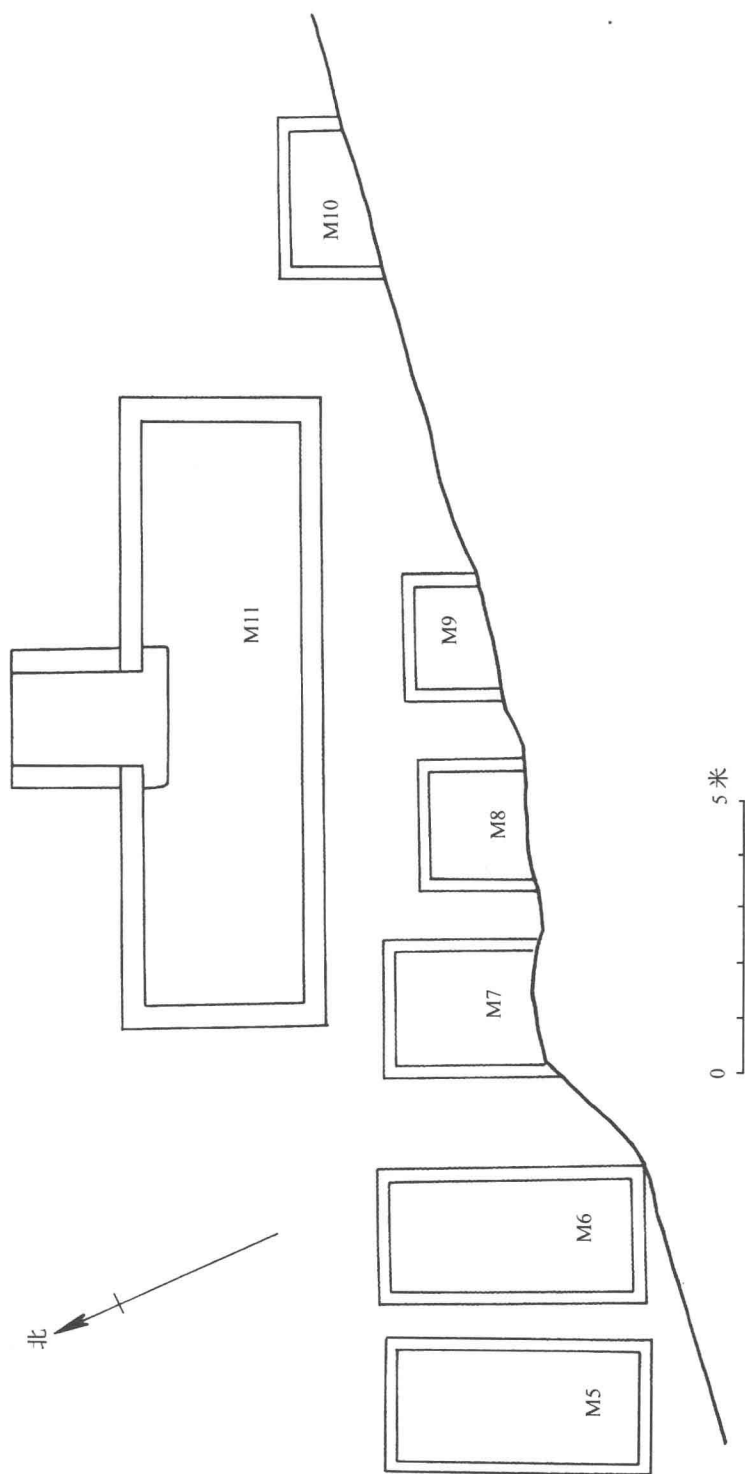
十街坊遗址位于成都市南郊的棕树村，北距成都市二环路南二段约 900 米，西距人民南路约 200 米，东邻科华路南延线。1998 年底，成都市统一建设办公室拟在此修建十街坊住宅小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文物勘探中首次发现这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又清理了一批汉代砖室墓。

十街坊遗址位于成都平原东部，地理条件优越。海拔约 492 米，地势平坦，地表高差不超过 0.30 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适宜，利于农耕，是人类理想的生活场所。

文化层主要分布在工地西北部的一条东北—西南向的土埂之上，土埂方向约 70~80 度。东北延续至该工程之外，西南被晚期破坏，工程范围内长近 100 米、宽 15~40 米。文化层也就随土埂走向呈带状分布。为了了解文化堆积和遗址性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1998 年 12 月底至 1999 年 4 月中旬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首先，我们将遗址分为东、中、西三区，每区分别按正方向布 5 米×5 米探方 4 个，由于东区文化层堆积相对较好，又增布探方 6 个，而在西区发现了二座和遗址同时的墓葬，又新布 5 米×5 米探方 8 个，发现一处墓地。1999 年 2 月 12 日，完成了这一批探方的发掘。为了解土埂情况和当时人类生活的环境，1999 年 3 月初，我们又在西区垂直于土埂布 5 米×5 米探方 25 个。发掘工作于 4 月 13 日结束。实际发掘面积 955 平方米。下面就 1999 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分汉代文化遗存和宝墩文化遗存两部分介绍如下。

壹 汉代文化遗存

汉代文化遗存以汉代墓葬为主，共清理了 11 座汉代砖室墓。勘探中清理的 4 座（编号 99CSM1~M4）分布较为零乱，相距较远，墓向差异大，墓葬结构也不相同，应是独立的 4 个墓葬。在小区道路施工断面上发现并清理的 7 座砖室墓（编号 99CSM5~M11）（图一），有 6 座（M5~M10）为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墓，并有规律地由西向东排列，除 M10 的墓向为 10 度外，其余 5 座墓的方向均为 20 度。M5、M6、M7、M8 距地表较浅，墓砖均为长方形青灰素面砖。M9、M10 距地表较深，墓砖均为长方形菱形纹花边砖。这 6 座墓葬共用一个封土堆，封土堆略呈圆形，残存不多，高仅 1.5 米，直径约 28.5 米。封土夯筑而成，可分 3 层，第 1 层灰黄色五花土，夯筑紧密，夯层与夯层之间的界限较为清楚，厚约 1.1 米，夯层厚 0.08~0.1 米。第 2 层为青灰色五花土，结构较紧密，黏性较强，不能清楚地分出夯层，厚 0.2 米。第 3 层为灰褐色五花土，含少量沙，略带黏性，结构较紧，厚 0.2 米。封土较为纯净，仅含有少量陶片和灰烬。M5~



图一 十街坊遗址汉代墓地(M5~M11)总平面图

M10 排列有序，共用一个封土，应属同一个家族的墓葬。M11 位于 M7、M8、M9 的北侧，打破该封土堆，是一座带壁龛长方形单室墓，墓向 105 度，虽然和前述 6 座墓的方向差异较大，时代也稍晚，但并没有打破原有墓葬，可能仍属于该家族的墓葬。

一、墓葬结构

这 11 座墓葬都为长方形砖室墓，依据平面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单室墓、有甬道的单室墓、有壁龛的单室墓和多室墓四类。

1. 长方形单室墓

8 座。均为小型墓，长多在 5 米以内。以 M2 和 M5 为例介绍如下。

M2，墓葬上部被破坏，基底距地表仅 0.65 米，方向 100 度。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全长 6.37 米。墓道呈斜坡状，前窄后宽呈梯形，长 2.15 米、宽 0.9~1.1 米，深 0.14 米。墓室长 4.22 米、宽 1.14 米、残深 0.3 米，墓壁均错缝平铺，厚 0.2 米，底砖残存较少，以顺墓向平铺为主，厚约 0.07 米。该墓均用长方形青灰色花边砖，纹饰有菱形纹和联璧纹两种。砖的规格是 38 厘米×20 厘米×6.5 厘米（图二）。

该墓由于扰乱和破坏，出土器物极少，仅有少量陶罐残片和东汉五铢钱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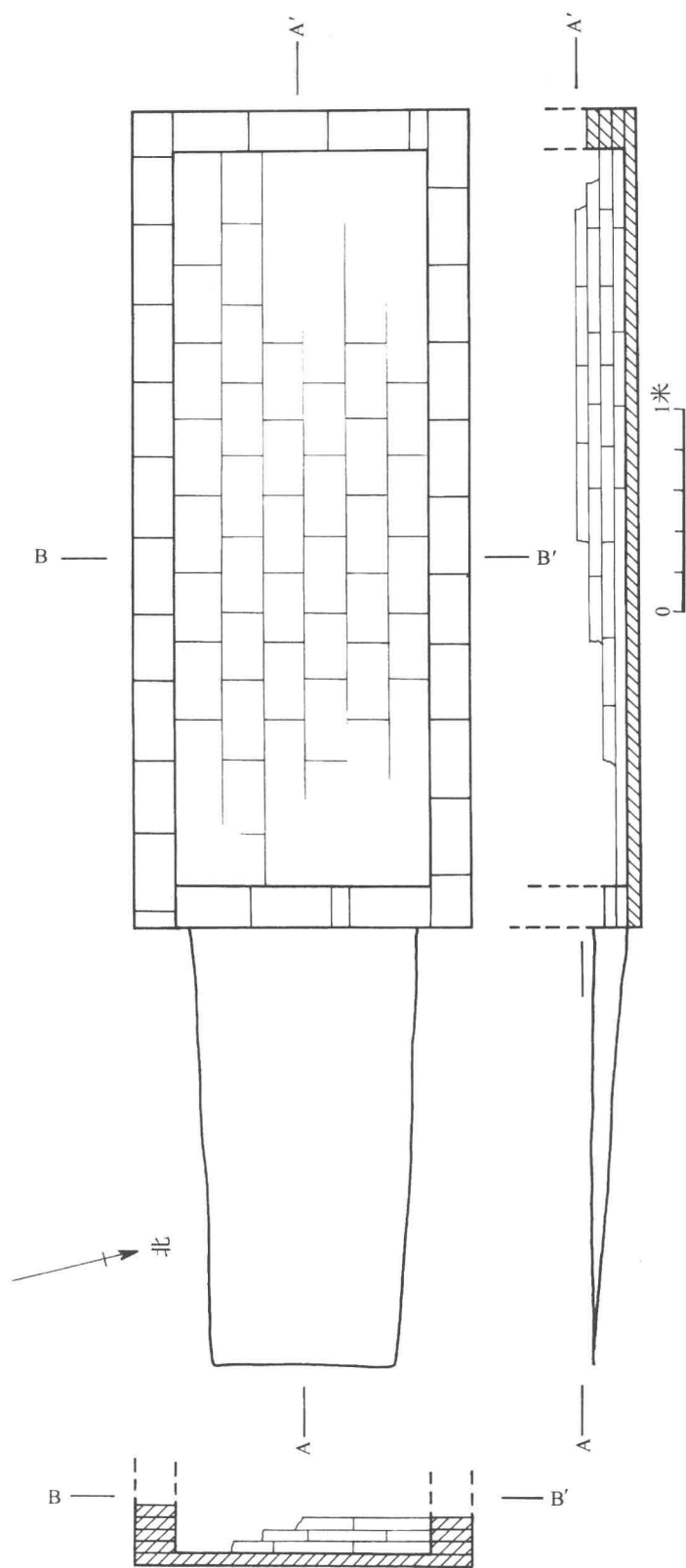
M5，保存基本完好，但券拱不存，全长 4.1 米，宽 2.38 米，残高 0.77 米，墓向 20 度。墓室长 3.7 米、宽 1.84 米。东西两壁的直墙下部用长方形青灰素面砖错缝平铺，高 0.55 米，厚 0.2 米，直墙上部用楔形砖平铺，残高 0.22 米，厚 0.24 米，后壁用砖平铺，残高 0.32 米，封门墙下部错缝平铺二层砖，其上的左右两侧用砖平铺，中部则用砖竖砌。基底砖均顺墓向平铺一层，厚约 0.07 米。该墓用砖有两种，规格分别是 46 厘米×19.5 厘米×6 厘米和（39~32）厘米×23.5 厘米×6 厘米。葬具和尸骨均腐朽不存，葬式不明。该墓随葬器物保存较好，集中出土于墓室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中部南端也随葬有少量陶器，可辨器形有陶罐、釜、井、房、鸡及铜钱币、铁刀等。

2. 有甬道的单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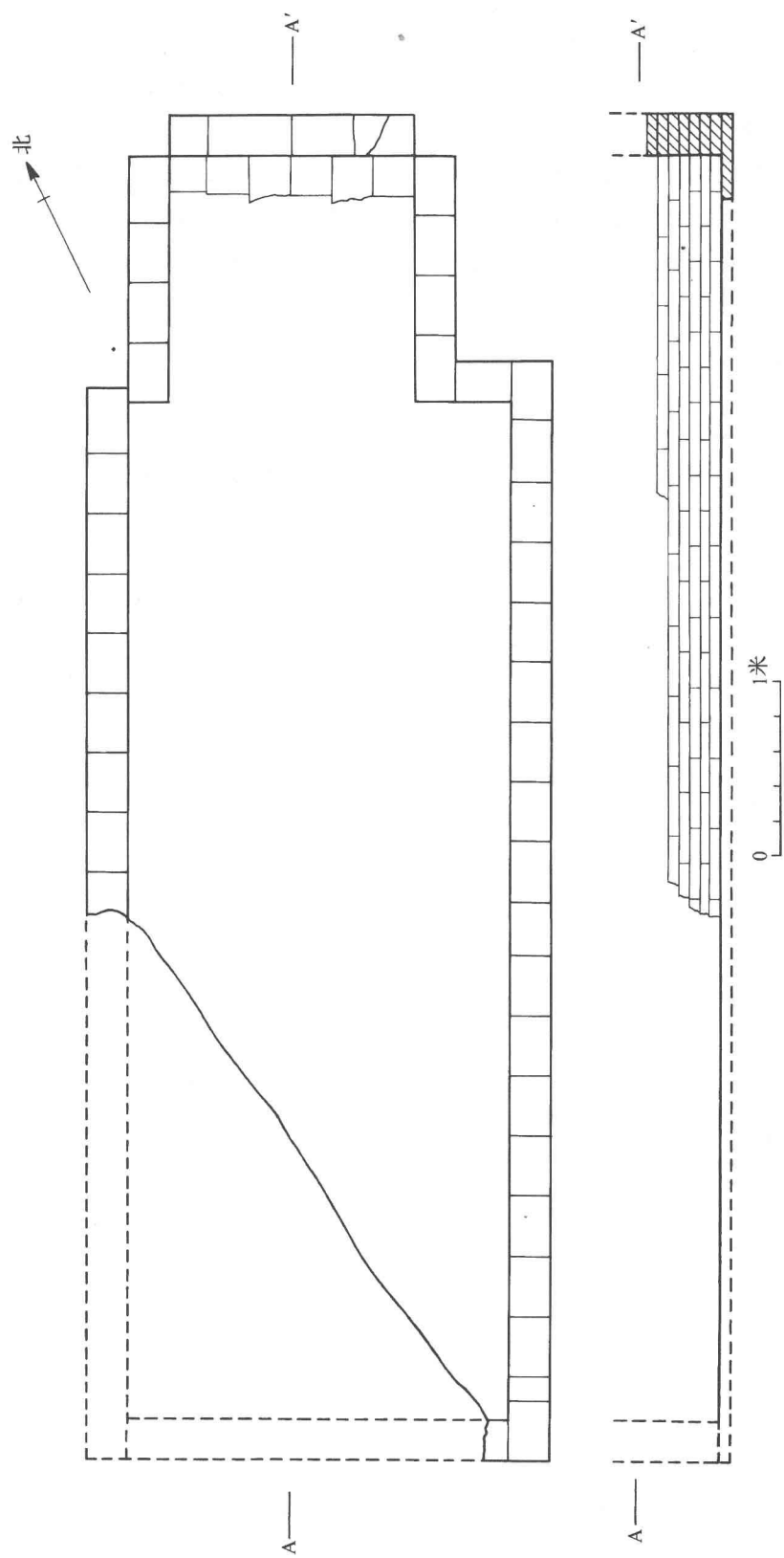
1 座（M4）。由甬道和墓室组成，甬道位于墓室北端的一侧，墓向 25 度，基底距地表 1.25 米。墓葬总长 7.60 米、宽 2.62 米，甬道长 1.4 米、宽 1.38 米，墓室长 5.77 米、宽 2.16 米，残高 0.36 米。墓葬直墙残存部分均错缝平铺，底砖顺墓向平铺一层，厚约 0.7 厘米。该墓用砖单一，均为长方形青灰素面砖，规格是 34 厘米×22 厘米×6 厘米。由于破坏和扰乱，该墓仅出土少量陶器残片（图三）。

3. 有壁龛的单室墓

1 座（M11）。由甬道和墓室组成，墓葬全长 10.5 米、宽 3.5~5.8 米，基底距地



图二 十街坊遗址 M2 汉墓平、剖面图



图三 十街坊遗址 M4 汉墓平、剖面图

表 1.32 米，方向 105 度。由于券拱已毁，墓室底砖及部分墓壁直墙砖也已不存，根据直墙基础及残存直墙壁分析，该墓应为长方形单室券拱砖墓。墓室长 9.55 米、宽 2.54 米、残高 0.7 米。四壁直墙均用砖错缝平铺，厚 0.38 米。壁龛位于北壁中部，券拱式，龛底低于墓室底 0.2 米，宽 1.26 米、进深 1.3 米、残高 0.72 米。起券处距龛底 0.56 米。墓葬直墙基础经过换土处理，其方法和结构和下文叙述的 M1 相同。该墓均用长方形青灰素面砖，规格分别是 38 厘米×26 厘米×7 厘米和 38 厘米×25 厘米×5 厘米（图四）。

4. 长方形多室墓

1 座（M1）。该墓由甬道、前室、中室和双后室组成，全长 11.85 米，宽 1.85～5.3 米。方向 350 度，基底距地表 0.85 米，封门墙用砖错缝平铺，宽 1.82 米、厚 0.24 米、残高 0.24 米。甬道长 1.4 米、宽 1.35 米。前室长 2.9 米、宽 2.26 米，前室和甬道底在同一平面。中室长 3.23 米、宽 2.75 米，中室底高于前室底 0.11 米。中室前端设有一道肋拱，肋拱宽 0.47 米、厚 0.4 米。中室和后室间设有一阶梯式过道，长 0.36 米、宽 1.04 米。双后室左右并列，大小、形制相同，相邻直墙之间有 0.22 米的间隙。右后室长 3.46 米、宽 2.07 米。墓葬直墙均用砖错缝平铺而成，厚 0.21 米。墓葬基础采用换土的办法进行处理。首先，在直墙下开挖基槽，然后用卵石夹黄泥填实，以增强其强度和墓葬的稳定性，再砌墓墙。单墙基槽宽 0.4～0.46 米，深约 0.4 米，后室中墙基槽宽 0.9 米，深 0.4～0.45 米。

由于该墓后期破坏严重，底砖多已不存，随葬器物保存极差。仅出土少量陶罐、钵、陶俑、陶房和陶摇钱树座残片，以及东汉五铢钱币。该墓用砖均为花边砖，纹饰以联璧纹为主，规格是 40 厘米×20 厘米×7 厘米（图五）。

二、出土器物

汉代墓葬是四川地区历代墓葬中随葬器物最丰富的墓葬之一，出土遗物特别丰富。虽然这批墓葬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扰乱，仍出土了不少器物，据质地可分为陶器和铁器两类，另有大量钱币。现分别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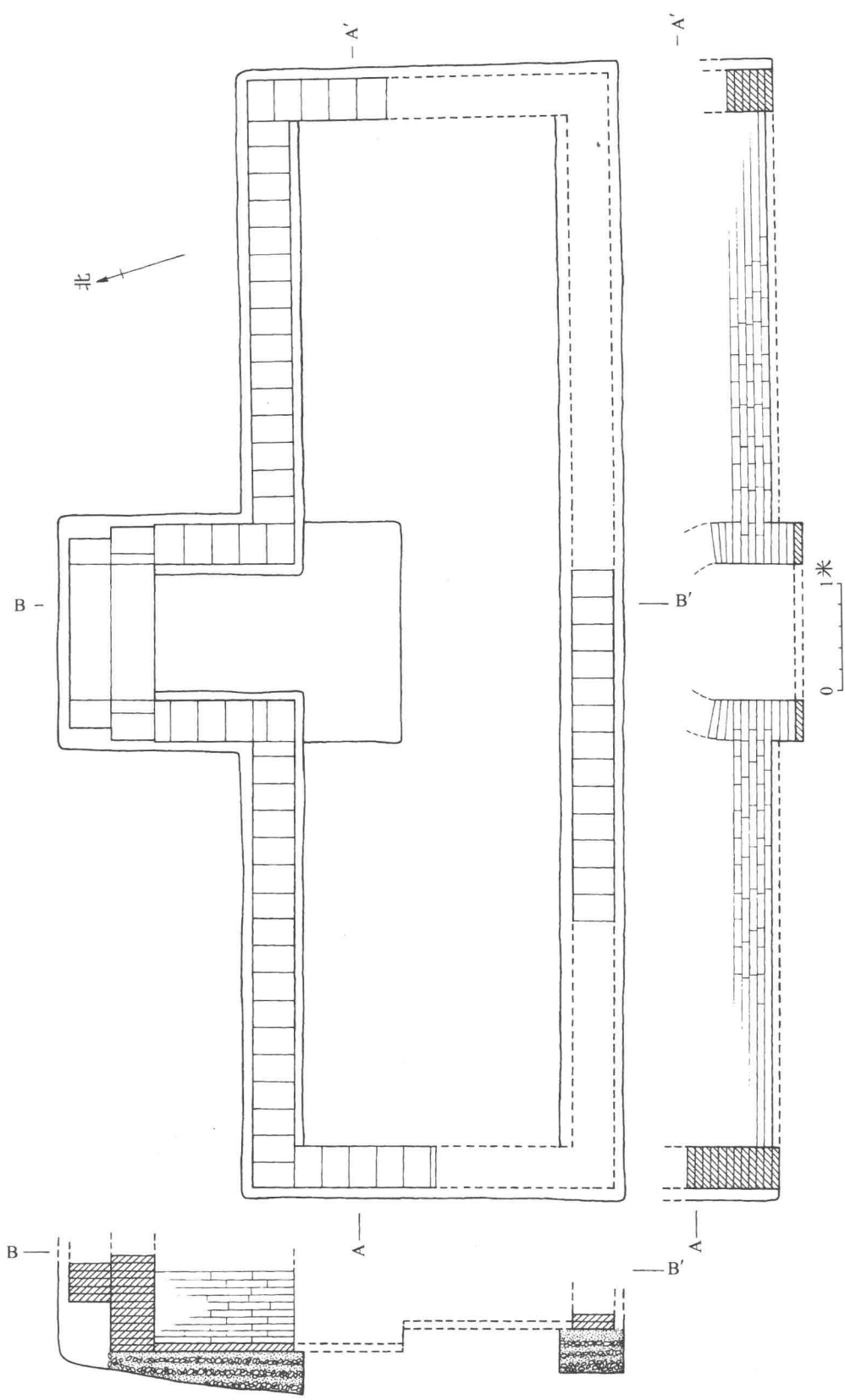
1. 陶器

32 件。以夹砂灰褐陶和灰褐黑皮陶为主，器型有罐、釜、仓、灶、井和陶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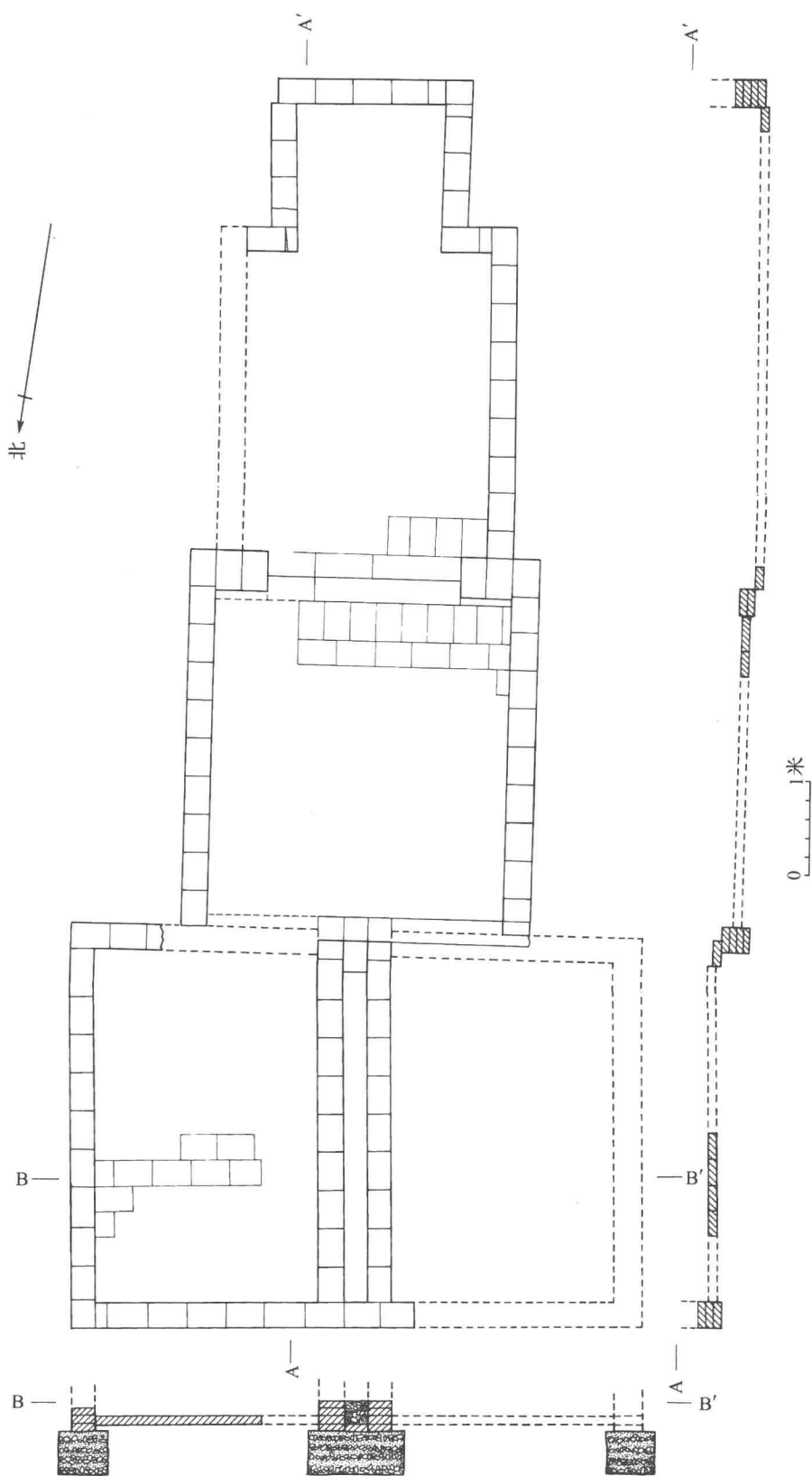
罐 分三型。

A 型：分二式。

I 式：标本 M5:1，小口、侈口、圆唇、短束颈、圆肩、斜弧腹、平底。肩部饰一至二周凹弦纹，器身最大径在腹上部。口径 9 厘米、腹径 18.4 厘米、底径 11 厘米、高 13.9 厘米（图六，1）。



图四 十街坊遗址 M11 汉墓平、剖面图



图五 十街坊遗址 M1 汉墓平、剖面图

Ⅱ式：形制和Ⅰ式相似，仅底微内凹。标本 M6:12，口径 8.1 厘米、腹径 16 厘米、底径 10.3 厘米、高 10.9 厘米（图六，2）。

B 型：标本 M5:11，侈口、尖圆唇、短颈，颈肩间似有折，斜肩、鼓腹、平底。器身最大径在器身中部。口径 10.2 厘米、腹径 18.8 厘米、底径 13.4 厘米、高 14 厘米（图六，3）。

C 型：标本 M5:6，直口、尖圆唇、直颈、圆肩，鼓肩，平底。口径 4.8 厘米、腹径 7.4 厘米、底径 3.6 厘米、高 5 厘米（图六，4）。

釜 均为敞口圜底釜。分二式。

Ⅰ式：标本 M6:4，敞口、尖圆唇、束颈、圆肩、鼓腹、圜底，器身最大径在腹中部，肩部以下至底满饰菱形纹。口径 19 厘米、腹径 18.6 厘米、高 10.8 厘米。标本 M6:13，敞口，束颈，溜肩，鼓腹，圜底，器身最大径在腹下部，腹部以下满饰细绳纹。口径 19 厘米、腹径 18.6 厘米、高 10.8 厘米（图六，6）。

Ⅱ式：标本 M6:9，形制和Ⅰ式相似，腹微鼓，腹部外接一圆形柄，柄上翘，顶端呈勾状。腹中部戳印菱形纹。口径 15.8 厘米、腹径 14.7 厘米、高 8.6 厘米，柄长 10.6 厘米、直径 1.5~3 厘米（图六，7）。

仓 3 件。形制基本相同。标本 M6:16，口微敛，圆唇，平折肩，直腹中部微鼓，平底。口径 9.74 厘米、腹径 14.7 厘米、底径 17 厘米、高 30.9 厘米（图七，2）。

井 分二式。

Ⅰ式：标本 M5:12，直口，口呈方形，平沿呈“井”字形，方唇，中长颈，上部略大，井身上、中、下各饰一周附加堆纹，其上又饰压印纹。井沿上设有对称的两个长方形穿孔，应是与井上建筑相连接的插孔。口边长 7 厘米、底径 20.1 厘米、高 23.85 厘米（图七，3）。

Ⅱ式：标本 M6:17，井口、井身的形制和Ⅰ式相似，仅井口和井身相交处呈顿折状，附加堆纹呈波折状，也有压印纹，井上建筑保存较好，井沿插孔中各插有腰鼓状支架，支架横梁上设一穿孔。支架横梁上端和四阿顶式的屋顶相连。井口边长 9 厘米、底径 22.8 厘米、高 27.3 厘米。井上建筑高 15.2 厘米（图七，4）。

鸡俑 标本 M5:8，首、腿均残缺，长颈，身肥大，鸡冠较大，尾上翘。残高 16 厘米（图七，1）。

2. 铁器

在 M5 内出土铁刀 2 件。因锈蚀，其形制、大小均不详。

3. 钱币

有西汉五铢、东汉五铢和新莽大泉五十等。